

选角瑕不掩瑜,《生命树》足够“真”

记者 刘宗智 济南报道

现实困境

《生命树》以1996年的玛治县(虚构)为起点,讲述女警白菊加入巡山队,与副县长多杰共同打击盗猎采活动,共同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故事。巡山队经历解散与重组,十多年后,白菊与旧友追查多杰失踪真相,守护高原生态平衡。

剧集采用双线叙事,一线是巡山队在极端环境下的生死追击;另一线是山下县城困顿而真实的日常。两条线索交织,共同指向一个沉重却无法回避的核心——穷。这种穷,首先是物资的绝对匮乏。剧集开头,多杰的巡山车队在博拉木拉荒原弹尽油绝,只能依托车身作为掩体,盗猎分子的子弹肆意击打在荒原的冻土上,激起阵阵尘烟。镜头扫过队员们干裂起皮的嘴唇、因缺氧和焦急而泛红的脸庞,以及身后那一望无际的苍茫大地,这场抓捕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

镜头转向山下,贫困以另一种形态渗透。县医院数月发不出工资,县长林培生无法兑现对巡山队的拨款承诺。正因要摆脱贫困,地方政府才在招商引资与生态保护之间艰难摇摆。以林培生为代表的“发展派”,将开矿视为摆脱贫困的捷径;以多杰为代表的“守护派”,则坚持捍卫脆弱的生态平衡。

也正因贫困,盗猎藏羚羊的暴利才显得如此狰狞。随着剧情发展,可细致地观察到盗猎团伙规模的膨胀,从最初“断指”团伙的数辆车、百余张皮子,到后来敢于枪杀巡山队员、炸毁仓库直至拐卖人口扩充势力。实景中残酷的自然环境,与山下窘迫的社会经济,构成了盗猎滋生最适宜的温床。难得的是,剧集并未一味沉溺于沉重,山下生活的温情片段与队员间的幽默互动,为作品注入一抹亮色与温度。

守护者

《生命树》最打动人心之处,在于它塑造了一群“去神性、存人性”的守护者。他们没有光

取材于真实事件的剧集《生命树》目前正在热播。部分观众认为其题材真实、取景壮阔、群像生动,在沉重叙事中穿插恰如其分的轻喜剧笔触,整体可圈可点;也有观众直言,女主角的表演风格在整体写实基调中偶显“出戏”,削弱了故事的真实感。在口碑分岔的背后,《生命树》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它能否跨越形象的争议,触动观众内心深处对生态保护的深切共鸣?



双脚丈量、用生命践行的日常。

演技争议

关于女主角白菊的“适配度”争议,是《生命树》讨论中绕不开的一环。部分观众认为,饰演者杨紫的外形气质,与想象中饱经风霜的高原女警存在距离。这一直观感受,触及了影视创作中“形似”与“神似”的经典命题。

若深入剧情,会发现白菊的角色设定本身便带有“闯入者”视角。她并非博拉木拉荒原土生土长、自幼与严酷环境搏斗的草原儿女,而是一个怀揣理想、从相对常规的警校系统被抛入极限情境的年轻干警。通过剧情可以看出,县政府开会时,即使是林县长也对博拉木拉无人区内部的情况知之甚少,更何况一名刚毕业没多久的警校学生?

这种“不太像”,恰恰是她成长逻辑的起点。剧中,她初次进山便撞见了盗猎分子屠杀藏羚羊群的现场。广袤的荒原上,成百具被剥皮的藏羚羊尸体铺陈开来,血腥气仿佛能穿透屏幕。紧接着是队友冬智巴在眼前被射杀,自己亦在争斗中撞到头部意外昏迷。这场戏里,杨紫的表演层次清晰,从最初的震惊麻木,到生理性的反胃颤抖,再到悲愤绝望的无声嘶喊,她将一个人的认知体系被残酷现实瞬间击碎的过程演绎得颇具说服力。

白菊的每一次成长,都伴随着“血淋淋”的代价。当卡车陷于河滩时,她和同伴独守荒野,经历了脱水、饥寒交迫甚至一度陷入失温的险境。哪怕已经踉踉跄跄,面对暴雪时,她的第一反应仍是“跑”。

从外形看,杨紫并非“白菊”的最佳适配者。但对演员的要求,或许不应仅停留在外貌的“像”,更应关注演员是否真正走进了角色的灵魂,是否让观众相信了她走过的路。在这个意义上,白菊“立住了”。《生命树》或许未能满足所有关于“像”的想象,但它触碰了“真”的维度,并在那片精神旷野上,奋力植下了一棵关于生命、关于坚守的树。

在与盗猎者的生死对抗中,他完成了从谋生到守护的信仰升华。他口中那句“雨跟着云走,羊跟着草走,好人跟着好人走”的朴素谚语,也从随波逐流的感慨,变成了行动的信条。

更旦饰演的桑巴是队里的“文化人”,怀揣一本皱巴巴的英语教材,梦想通过学历提升走出大山。队友的牺牲曾让他恐惧、迷茫而选择离开,但当得知白菊要孤身进山救援时,他牵着牦牛,默默归队,最终凭借对地形的熟悉,在关键时刻与队友并肩完成反击。

即便是剧集中着墨不多的角色,也拥有丰富的生命轨迹。比如白菊的母亲张院长,最初只是慈爱稳重的医生形象,直到女儿遭遇险情,她才情绪爆发,讲述了那段雪灾中救下养女白菊的过往。儿子白及被盗猎分子拐卖的消息传来时,她独自骑马持枪追赶,展现出角力深藏心底的刚烈与坚韧。

这些角色之所以可信,正因为他们是活生生的、在土地上行走的人,他们的守护,是用

编辑:孔昕 美编:陈明丽

齐鲁晚报

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减少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